

基本法 25周年

# 譚惠珠 立法禁港獨應納入23條

## 保護國家安全維護主權

由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主辦的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昨日連續第二日在城市大學舉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強調，要求香港「獨立」肯定是違反基本法及憲法，如果要就《反港獨法》立法，可以將相關內容納入基本法23條，但她認為，現時還不是訂立《反港獨法》的時候。譚惠珠亦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港獨」一定錯，鼓吹這種思想也是錯。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文軒



▲譚惠珠強調，要求香港「獨立」肯定是違反基本法及憲法 本報記者黃洋港

### 馬耀添：立會議事規則主次要分明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導：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的情況日趨嚴重，立法會法律顧問、大律師馬耀添昨日在研討會指出，在議事規則未進行有必要的修改前，立法會主席負較大的責任，適當地行使基本法所賦予他主持會議的權力，包括香港終審法院就這權力所確認的固有及附帶權力，控制會議的進程，在有需要時，就議案的辯論定出時限，或命令終止。



▲馬耀添

馬耀添昨日表示，臨時立法會和第一屆立法會以回歸前立法局的《會議常規》作為藍本，制定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充分落實了基本法所體現的「一國兩制」的原則，對於回歸時香港順利過渡，維持原有議會制度不變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續說，議事規則便立法機關履行基本法所賦予的職權的法律文件，它具有自己的生命，有需要因應立法會的組成而作出相應修改，發揮正當的作用。至於拉布是否議事規則的漏洞，馬耀添認為，議事規則的主次要分明，議事規則是提供框架服務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才是主體，「換言之，有什麼立法機構，便會有什麼的議事規則。」他又指，如果立法會議員認為要更改議事規則，便需要利用智慧達成修改目標，因為那是集體的決定。

### 顧敏康：憲法是基本法母法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導：反對派只重「兩制」而不顧「一國」，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表示，香港以往過度強調基本法而忽視了憲法，只講「着數」而少提責任，乃至近期出現的「佔中」及「港獨」，甚至是否要否定人大8·31決定，均是對憲法認識不足之故，有必要加大宣傳力度。



▲顧敏康

顧敏康昨日出席基本法25周年講座時，駁斥「憲法與香港無關」的論調。他表示，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而憲法又是基本法的母法，「當然適用於香港」，如今有人對此認識不明，有必要在香港普及憲法。至於有人以「一國兩制」為由排斥憲法，他強調，憲法是全國最高的憲法，不存在兩個法域的問題。談到港人對憲法認知不足，顧敏康指出，在香港回歸之初，過度強調基本法，而忽視了憲法應有地位的宣傳；同時亦過度強調保護港人的利益，以及香港能得到什麼「着數」，中央會有些什麼大禮，卻很少提及香港對於「一國」的責任。他以2011年的剛果金案為例，指法院一審二審均認為應對剛果金使用相對豁免權，使得外交部駐港公署連發三封信，要求其從國家利益考慮，考慮是以絕對豁免還是相對豁免處理更為合適。他說，從中可看出，即使是法官對「一國」的理解亦存在問題。

### 專家籲港人勿故步自封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導：香港正因政改等議題陷於內耗，城大法律學院中國法及比較法講座教授王貴國呼籲港人放寬眼界，把握亞投行的發展機遇，勿糾結於細微之處。他暗諷反對派發動的「佔中」及「反水貨客」行動如孩童之舉，難阻整個發展大勢。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指出，若港人故步自封，只會錯失黃金機會。

### 王貴國：加入亞投行利港

在昨日的基本法研討會上，王貴國表示，香港為了普選的問題吵吵鬧鬧，但若將之放在國家的角度，或「一帶一路」的大環境中看待，則不是一個大問題，之前的「佔中」及「反水貨客」行動亦如是。他以農村蓋房子作比喻，指小孩對房子亂扔石頭，行徑非常可笑，「因為阻擋不了整個大勢，房子終究是要蓋起來的」。他續說：「現在之所以仍在糾結，就是因為不能站在高處俯瞰全局，其實大可不必，我們應把眼界放寬一點。」談及香港的機遇，王貴國指出，亞投行平均每年需投資8000億美元，「香港再有10個李嘉誠也投資不完」，且其中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你要是想做，是做不完的」。他認為，香港現在已然被納入「一帶一路」的戰略當中，關鍵在於如何利用這個機會。他亦指，在亞投行的建設當中，希望中國將香港公民當作中國公民來對待，不再視香港投資者為外商，相信會是最好的人心回歸的方法。

### 林新強：把握國家經濟快車

前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亦指，香港律師具有國際視野，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時處理相關的法律問題，大有可為，但最近的「佔中」事件有不少律師在背後參與，令他感到痛心。「一些不願意與國家同步發展，故步自封的人，又怎樣可以搭上中國的經濟快速列車呢？」他強調，香港律師若不把握現在，認識未來，只會白白錯失一個黃金機會。



▲林新強 ▲王貴國

## 印度學者批港黑金政治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被揭發2013/14年度間，向港大不同部門作出四筆共145萬元的神秘捐款，多個反對派議員亦被揭發收受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的「政治黑金」，事件曝光後，引發各界嘩然。來自印度的城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Rajesh Sharma昨日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比較香港與印度的民主發展，指印度的政黨雖可收取政治捐款，但有條文規定，當收取2,500港元以上的金額便需向政府呈報，有政黨更主動將收取的每一分錢捐款都於網上公布。Rajesh Sharma又暗諷「三丑」不誠實，指戴若光明正大，便應將收到捐贈的詳情在網上公布，清楚交代來源。他強調，收款人必定會知道獻金來源及保存相關紀錄，而不是一味推說捐贈者是「無名氏」。不知道經常將「國際標準」掛在嘴邊的戴耀廷等人，又會如何回應Sharma教授所說的標準呢？

## 學者倡實行防衛型民主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昨日在港出席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時指出，有些立法會議員在談及普選時，明顯沒有顧及基本法的明文規定，並且與社會運動互相結合，由以往「行政吸納政治」，變成現在政治阻撓行政，運動劫持憲政。此外，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港澳基本法研究會秘書長林來梵認為，香港應該實行「防衛型民主」，防範破壞民主的力量。政治憲政主義由政治機構實施憲政，而司法憲政主義就是由司法機構實施，重申香港的政治憲政主義包含內部公開的對峙，且與民眾社會運動有密切的聯繫，而司法實施受制於普通法思維，要警惕簡單移植普通法憲政主義，將英國普通法的權利保障凌駕於基本法之上、國家主權和安全之上。

### 林來梵：保護好核心價值

林來梵則指出，回歸以來，香港民主政治有若干令人矚目的進步，而基本法及相關法律甚至為2017年開始推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提供了明晰的藍圖，如能順利實現，將會是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他強調，香港應該實行「防衛型民主」，即是推行民主政治當中，同時努力保護其他必要的核心價值，包括保護好法治、自由

### 鄒平學：要尊重內地制度

談及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與適用，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表示，首先要區分憲法的效力與適用，不能混為一談，法律效力是邏輯上二元的問題，但法律適用則是事實問題。憲法的效力體現於所代表的社會基本價值以及對社會的作用力，憲法的適用性則是直接體現於憲法規範的直接實行，強調香港實施的制度不是內地所實施，希望內地尊重，同樣香港亦要尊重內地制度，不得加以破壞。「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一定是違憲的。」



在研討會上，有與會者提問指，在23條未立法及未有《反港獨法》的前提下，如果有人申請司法覆核，要求香港有權宣告「獨立」，有人因此要進行司法覆核，譚惠珠認為，假如將一個違法行為進行司法覆核，法院基本上是不會受理的，而司法覆核針對是有權力的機構，申請司法覆核的前提就是權力機構犯法及申請人因此受到影響。如果政府宣布就《反港獨法》立法，「就算你司法覆核，都不會有對你有利的結果，因為23條立法中，我們要為國家安全進行立法。」

### 行政立法關係站在「十字街頭」

譚惠珠表示，香港應該就基本法23條立法，其中一條就是不能分裂國家，現在提《反港獨法》不是時候，應該等政府在適當的時間進行諮詢，為23條立法。譚惠珠說，雖然23條沒有專門針對「港獨」問題，但23條本身是保護國家安全，肯定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統一的部分，政府也應該有權立法。她續說，「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港獨』一定錯，鼓吹這種思想也是錯，我自己是毫不贊成。」

但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董立坤直指，香港近年出現「佔中」及有人搞「港獨」，企圖顛覆政府，正是因為香港沒有為基本法23條立法，才使得有些人肆無忌憚，因此香港在國家安全立法一事上刻不容緩。他說，之前有人建議將《國家安全法》納入基本法附件內，但中央為了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繁榮穩定，至今仍未這樣做，但如果任由「港獨」及反對勢力發展，令香港成為動亂基地，他相信引入《國安法》會成為最後的解決方法。

### 陳端洪：警惕移植普通法

陳端洪昨日表示，關於基本法的實施，有一種命題就是大陸法與普通法的解釋方法衝突，但他認為實質性區別和衝突在中央政治憲政主義與香港政治憲政主義、司法憲政主義之間。他續說，

### 鄒平學：要尊重內地制度

鄒平學表示，首先要區分憲法的效力與適用，不能混為一談，法律效力是邏輯上二元的問題，但法律適用則是事實問題。憲法的效力體現於所代表的社會基本價值以及對社會的作用力，憲法的適用性則是直接體現於憲法規範的直接實行，強調香港實施的制度不是內地所實施，希望內地尊重，同樣香港亦要尊重內地制度，不得加以破壞。「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一定是違憲的。」



▲陳端洪



▲林來梵



▲鄒平學

## 劉迺強：需突出「一國」權威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導：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日出席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時強調，起初制訂基本法是解決信心問題，最主要的是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但現時卻出現香港年輕人承認中國人身份的問題。他重申，現時需要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尤其是在法治、教育和傳媒方面，否則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無法解決問題。劉迺強表示，由於現在與昔日的情況不同，「問題不再是『兩制』的矛盾，而是你是否承認有『一國』的矛盾。」他續指，坊間有所謂「抗命不認命」，就是不承認中國人的身份，但當時制訂基本法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沿用這種思路的話，中央科作為必修科也是無用。劉迺強認為，如果不能在法治、教育、傳媒樹立「一國」的權威，怎樣討論「一國兩制」也是於事無補。至於社會終日爭吵是否拖慢香港發展，他認為，爭吵出現是因為大家不承認一個共同理念、共同權威，市民之間缺乏互信，要是欠缺互信的話，便難以成立調解制度；若果社會撕裂無共識，調解不是好的方法。

劉迺強指出，在基本法框架下，現時要重新突出「一國」的概念和權威，例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當中提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些就是「一國」在香港的權威，而陳佐洱提出的「一國」與「兩制」不是平起平坐、憲法與基本法不是平起平坐，也是「一國」的權威。不過，他質疑，香港在法治方面能否突出「一國」的權威，又如教育方面，中國歷史科的思路與國家發展是完全割裂，假如